学术动态

2016 年清史研究综述

朱　浒　刘素敏

2016 年的清史研究依然维持着高产局面。据粗略统计，在汉语出版物范围内，不计博、硕士学位论文，公开发表的论文也在 3000 篇以上、出版研究著作约 60 余部。毫无疑问，清史研究的这一产出规模，充分体现了其在研究队伍和资料两方面的雄厚基础，也是其他各断代史研究难以匹敌的。并且，其中涌现的许多成果，都对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清史研究具有积极意义。限于学力和篇幅，这里只能按照较为粗略的划分，将主要目光集中在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学术与思想文化、环境与地理景观等五个专题上。以下即按此分类加以介绍。

一、政治史研究

清代政治史研究延续着近年来的良好发展势头，成为 2016 年全年清史研究成果中分量最重的一个部分。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相比，现在的清代政治史研究无疑在内容、视角和方法上显得更为丰富和多元化，远远超越了拘泥于政治斗争的狭隘范围。但不容否认的是，这种研究范围的扩张在相当大程度上还带有粗放经营的特征，也难免给人以过于枝蔓的隐忧。因此，如何在确切把握政治史研究中的“本末”与“干支”的基础上，从根本上重建政治史研究的主体地位，仍是一个任重道远的工作。

政治活动与事件　清初史事因材料不全，向多悬疑。清代首位摄政王多尔衮的死后遭遇，即属此类悬疑之列。顺治帝亲政后，清代各种官修史书对多尔衮祔太庙之事讳莫如深，张小李根据多种相关史料，对多尔衮祔庙经过、礼仪等问题进行了较为确凿的考释。张建则依据满文题本的记载，质疑了顺治帝夷平多尔衮园寝的旧说。① 杨珍通过比较满文、汉文档案文献的记载，重审了康熙朝鳌拜罪案问题，揭示了统治集团中权力斗争的复杂性。② 刘文鹏重新探讨了乾隆时期的彭家屏案，揭示了其中深刻的党争背景，而表面上的文字狱或许只是帝王整肃派系的手段。③ 马维熙对清代政务信息的失密问题开展了两项研究。其一认为在雍乾之际驻京提塘泄密问题上，用人机制不当是一个制度性的漏洞；其二通过论述嘉庆二十四年傅瑞祥京控一案，牵涉出一个朝政失密大案，反映了此时清代保密制度防弊机制的弱化。④

[**收稿日期**] 2017－08－30
[**作者简介**] 朱浒（1972－），男，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北京 100872，xnoghost@ sina. com；刘素敏（1990－），女，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1220277464@ qq. com

① 张小李：《顺治朝多尔衮神主升祔太庙浅考》，《历史档案》2016 年第 4 期；张建：《顺治八年损毁多尔衮园寝事新证》，《历史档案》2016 年第 4 期。

② 杨珍：《康熙朝鳌拜罪案辨析》，《历史档案》2016 年第 3 期。

③ 刘文鹏：《彭家屏案与雍乾党争》，《清史研究》2016 年第 1 期。

④ 马维熙：《清雍乾之际驻京提塘泄密问题研究》，《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6 期；《嘉庆二十四年朝政失密案研究》，《历史档案》2016 年第 4 期。

相对而言，2016 年关于晚清时期政治活动的成果更丰富一些。王瑞成围绕着李鸿章在同治十三年日本侵台事件中的活动，分析了其利用危机局面，成功走出了淮军从内部平叛之战时体制向应对西方的海防体制转型的关键一步，进而认为危机利用与权力外移是晚清权力关系变动和体制变化的重要路径。① 贾小叶分析了台湾建省讨论达十年之久的原因，认为以往较为忽视的“幕后”人事关系才是影响台湾建省决策的重要因素。② 王悦探讨了铁良南下一事的政治含义，认为此举是朝廷针对东南各省督抚权力进行中央集权的试探，却激化了统治阶层的内部矛盾，折射出清廷统治的严重困境与合法性危机。③ 贾小叶通过论述戊戌前后《国闻报》在报道宗旨和内容上的变化，认为该报与清廷关系由合到离的转变正是当时诸多趋新士人与清廷关系的一个缩影。④ 关于庚子时期的政局，较有价值的成果主要有：董佳贝利用新发现的中外交往信函，对义和团运动中总理衙门和清朝上层的外交进行了有益的补充；戴海斌聚焦于北京城陷后留守京官群体形形色色的表现，透视了非常时期中外交往的实相及国人面临国难时的心态；吴宝晓从区域文化的角度，以反洋教为线索，揭示了京畿义和团的发展主要受本地因素制约的一面；马忠文将荣禄置于晚清政局变动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指出从戊戌政变后到庚子时期，荣禄与刚毅之间的矛盾是该时期朝局演变的主要线索。⑤

关于清末十年的政局，尤其是立宪问题受到了较多关注。孙燕京深入分析了清末力挺宪政的少壮亲贵群体的政治心态，认为他们虽然突破了旧体制的惯常思维，但因其与生俱来的弱点及政治上的不成熟，导致最终满盘皆输。⑥ 韩策通过对汪荣宝替满族亲贵捉刀所作宪法说帖的分析，展示了留学生小臣与亲贵大臣联手影响清廷立宪决策的过程和模式。⑦ 林剑考察了丙午期间裁改都察院引发的冲突，认为保存名目、变通整顿成为都察院维系皇权体制与进入宪政政体的折衷选择，从而影响了丙午改制的成效。⑧ 武昌起义前后的政局是另一个较受关注的问题。马建标认为，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外患体现出来的“洋权”，内乱彰显的“绅权”，与袁世凯遥控的北洋“军权”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新的权势格局，而这一格局的核心人物就是袁世凯。⑨

政治制度与文化　对各类制度变迁的梳理，历来不乏关注。关于清代海疆管理，有两篇文章值得注意。其一是高志超提出，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采取的迁海措施，稳定了后金在河东地区的统治，也开了清初迁海之滥觞；其二是王立新认为清代吉林海域巡查是清朝对该海域行使主权的表征。⑩ 李文杰勾勒了清代御门听政制度的兴衰历程，指出该制度随着中央集权和奏折制度兴起而衰落。⑪ 徐雪梅认为，清朝丁忧制度既借鉴了前代成例，也体现了民族特殊性，反映出满洲统治者对本民族及汉族文化传统的政治态度。⑫ 吉辰考察了以往甚少注意的花衣期制度，指出这是清

---

① 王瑞成：《危机与危机利用：日本侵台事件与李鸿章和淮军的转型》，《近代史研究》2016 年第 2 期。

② 贾小叶：《晚清台湾建省的台前与幕后》，《史学月刊》2016 年第 7 期。

③ 王悦：《铁良南下的棱镜：对清末政局的多面透视》，《史林》2016 年第 4 期。

④ 贾小叶：《〈国闻报〉与戊戌－己亥政局的变动》，《天津社会科学》2016 年第 3 期。

⑤ 董佳贝：《庚子之役中总理衙门交涉补证》，《史林》2016 年第 5 期；戴海斌：《“无主之国”：庚子北京城陷后的失序与重建》，《清史研究》2016 年第 2 期；吴宝晓：《京畿义和团运动研究》，学习出版社 2016 年；马忠文：《荣禄与晚清政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

⑥ 孙燕京：《清末立宪中少壮亲贵的政治心态》，《史学月刊》2016 年第 7 期。

⑦ 韩策：《宣统二年汪荣宝与亲贵大臣的立宪筹谋及运作》，《广东社会科学》2016 年第 5 期。

⑧ 林剑：《风宪与立宪：清季都察院裁改的冲突》，《学术研究》2016 年第 11 期。

⑨ 马建标：《“洹上渔翁”：辛亥年间袁世凯的公众形象与权势格局》，《南京社会科学》2016 年第 8 期。

⑩ 高志超：《论后金时期的迁海》，《清史研究》2016 年第 1 期；王立新：《也谈清代吉林的南海巡查》，《清史研究》2016 年第 3 期。

⑪ 李文杰：《清代的早朝——御门听政的发展及其衰微》，《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 年第 1 期。

⑫ 徐雪梅：《清朝丁忧制度研究》，《历史档案》2016 年第 3 期。

代官场一项重要的礼仪制度，其中尤以万寿节规格最高，最能体现皇权专制的特性。[①] 郑金刚通过钩沉清代州县官府在行政运作时的“文书转述”模式，讨论了18世纪中后期的地方行政问题，认为这是清代国家在“小规模、低成本”条件下有效控制与治理广大乡村社会的一个策略。[②]

制度运行及成效是另外一个研究较多的领域。祁美琴通过对“内廷行走”人员的细致梳理，认为这些人实际上在皇帝身边形成了“要职”再聚合的办事机制，体现了清代皇权高度集中并在官僚体制上发生的重要变化和特征。[③] 刘凤云以督抚自身与钱粮亏空的关系为线索，认为其中责权关系的纠结始终影响着权力的运行，是官僚政治中无可克服的矛盾现象，也是导致钱粮亏空的成因及其无法遏制的根源。[④] 另有几篇讨论清代军制运行的文章颇有新意。王妍挑战了绿营向由汉人充任统辖官的认识，证明清代自顺治时期起就形成了旗人选任绿营官的制度。[⑤] 王刚发现，清廷自康熙后期起，为弥补旗人缺乏水战技能的不足，将部分绿营官兵编入八旗水师，从而出现了绿营编入八旗的反向流动。[⑥] 刘增合通过分析曾国藩为筹措军费而实行的隔省扩饷之举，揭示了近代制度变迁，人、制度、环境、需求等多种因素彼此牵制的历史实态。[⑦] 彭贺超考察了清末新政时编练新军的情况，认为当时中央缺乏专门的新式军政机构，以致地方督抚扮演了练兵方案设计者和实践者的双重角色，但他们并不是理想的决策者，以致练兵成效不彰。[⑧]

关于政治文化，近年来突出焦点是关于“新清史”的论争，2016年的争论热度虽有所下降，但仍有几篇较有深度的文章。刘文鹏对“新清史”思潮的脉络进行了梳理，指出这是“新清史”学者们将“内陆亚洲”理论运用到清代历史叙事的一个结果，但他们将满洲特性泛化为以游牧文化为核心的内亚特性，将“内陆亚洲”从一个文化概念演绎为与“中国”对立的政治概念，这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刘凤云则通过考察满洲奠都盛京的历史进程，认为“内陆亚洲”转向的提出，并不等于“内陆亚洲因素”足以左右清朝“大一统”政治及文化格局。[⑨] 常建华则反思了“新清史”强调康熙帝巡游五台山接续元朝传统的看法，认为建构满汉蒙藏多元一体国家形态才是康熙帝巡游五台山的追求。[⑩] 马雅贞通过分析清代战勋图像反思了清帝国武功的文化建构，力图跳出“汉化说”与“新清史”的框架，认为清帝国的军事文化并非只具备一成不变的满洲特质，而是透过汉人精英文化以建立“皇清文化霸权”。[⑪]

外交与中外关系　在此方面，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关于清前期外交关系方面的研究。赵卫宾考察了清朝与哈萨克汗国在雍正九年的首次交往，认为此举促成了双方在平准战争中的战略互动。[⑫] 郭文忠则根据满文录副奏折，纠正了旧说关于清朝与哈萨克首次通使时间的失误，并确定

---

① 吉辰：《清代的花衣期制度——以万寿节为中心》，《史学月刊》2016年第5期。
② 郑金刚：《文书转述：清代州县行政运作与文字·技术》，人民出版社，2016年。
③ 祁美琴：《从“内廷行走”看清代朝臣的“近侍化”倾向》，《清史研究》2016年第2期。
④ 刘凤云：《清代督抚在清理“钱粮亏空”中的权力、责任与利益》，《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
⑤ 王妍：《清代旗人选任绿营提督考》，《历史档案》2016年第4期。
⑥ 王刚：《清代绿营官兵编入八旗水师考析》，《清史研究》2016年第1期。
⑦ 刘增合：《行走在制度内外——曾国藩东征军费的筹策》，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87本第4分（2016年12月）。
⑧ 彭贺超：《清末新政伊始地方督抚编练新军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91期（2016年3月）。
⑨ 刘文鹏：《内陆亚洲视野下的“新清史”研究》，《历史研究》2016年第4期；刘凤云：《奠都盛京：清朝入关前文化体系的构建》，《清史研究》2016年第3期。
⑩ 常建华：《祈福：康熙帝巡游五台山新探》，《历史研究》2016年第2期。
⑪ 马雅贞：《刻画战勋：清朝帝国武功的文化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⑫ 赵卫宾：《清与哈萨克汗国的首次交往》，《西域研究》2016年第1期。

了哈萨克最早遣使表示归附清朝的时间。[①] 刘锦对雍正年间清朝首次遣使俄国的动因进行了深入探讨，认为此举有助于打破关于清代中国对外关系的传统认识。[②] 蔡香玉分析了乾隆末年荷兰东印度公司遣使赴京的缘起，指出不应忽视两广总督长麟的主动邀请所起的作用。[③] 何新华首次对清代存留的 500 余件朝贡文书进行了系统研究，旨在纠正以往认识朝贡制度的一些误区。[④] 朱玛珑通过分析 1874 年日本侵台事件引发的外交问题，认为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东亚主要口岸的商业报纸应是当时外交领事的重要消息来源。[⑤] 杨雄威探讨了晚清政府媚外形象的形成机制，认为由于民间与政府在外交问题上结构性的对立冲突，政府在一系列外交事件中不断被民间诟病，最终才坐实了这种形象。[⑥]

其次则是关于条约和国际法问题的研究。郭卫东质疑了中外条约以《尼布楚条约》为最早的成说，认为明清更替时期关于台湾的几件约章已具有近代中外条约的性质。[⑦] 侯中军考察了晚清时期主要因近代企业对外交涉时出现的“准条约”问题，认为这是当时外交职责不明确的产物，伴随着中国近代化而寓含于近代中国的条约体系之中。[⑧] 颜丽媛探讨了日俄战争后日僧在华传教权之争，认为这是清代中国成功运用国际法知识、严格解释条约，维护国家利益、贯彻本国主张的重要案例。[⑨] 廉德瑰驳斥了日本方面关于明清史料不能证明历史上钓鱼岛主权属于中国的说法，指出日本明治政府对该岛的所谓“先占”是违反当时国际法的。[⑩] 张卫明揭示了甲午战后国人在国际法框架下所进行的反割台斗争，展现了近代国际法的本土化与晚清外交的转型。[⑪]

在中外关系方面，晚清时期的中、日、朝关系较受关注。张礼恒剖析了“壬午兵变”对中日两国对朝战略的影响，认为朝鲜在清政府干涉朝鲜内政、强化属国政策的历史拐点中发挥了主体性作用。[⑫] 韩东育通过对《中日修好条规》的深入省视，认为其中体现了日本拆解宗藩体系的整体设计与虚实进路，近代以降东亚世界的整体变局和日本对邻国的侵越与压迫，亦始自条规，成于条规。[⑬] 许金生披露了 1909 年起日本外务省组织的对华舆论操纵活动，指出此举为后来对华实施宣传战打下了基础。[⑭] 戴海斌探讨了东亚同文会首任会长近卫笃麿的在华交际圈，认为其将人际关系渗入现实政治层面，对 19、20 世纪之交中日关系的发展产生了不容小视的影响力。[⑮] 关于清朝与其他国家的交往情况，主要有以下成果：张永攀对乾隆末至光绪初年西藏与哲孟边界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研究，对一些史料中的错误进行了考辨[⑯]；侯庆斌依据英法外交档案，分析了

---

① 郭文忠：《清朝与哈萨克汗国首次通使若干问题再探讨》，《清史研究》2016 年第 1 期。

② 刘锦：《罗卜藏舒诺与清朝首次遣使俄国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 年第 1 期。

③ 蔡香玉：《乾隆末年荷兰使团出使缘起》，《学术研究》2016 年第 10 期。

④ 何新华：《清代朝贡文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 年。

⑤ 朱玛珑：《外交情报与港际报业：以 1874 年台湾事件日、中两国轮船运兵消息为例》，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93 卷（2016 年 9 月）。

⑥ 杨雄威：《舆论与外交——晚清政府媚外形象的形成》，《近代史研究》2016 年第 6 期。

⑦ 郭卫东：《论明清更替时代的中外条约》，《清史研究》2016 年第 4 期；《简析近代范式中外条约的开篇》，《历史档案》2016 年第 4 期。

⑧ 侯中军：《论晚清中国的准条约》，《史林》2016 年第 3 期。

⑨ 颜丽媛：《清末日僧在华传教权的条约之争》，《清史研究》2016 年第 1 期。

⑩ 廉德瑰：《关于明清时期钓鱼岛归属的国际法分析》，《日本学刊》2016 年第 4 期。

⑪ 张卫明：《甲午战后拒割台湾的国际法运用》，《历史档案》2016 年第 3 期。

⑫ 张礼恒：《金允植、鱼允中与“壬午兵变”的善后处理》，《近代史研究》2016 年第 5 期。

⑬ 韩东育：《日本拆解“宗藩关系”的整体设计与虚实进路：对〈中日修好条规〉的再认识》，《近代史研究》2016 年第 6 期。

⑭ 许金生：《〈清国报纸通讯纲要〉与近代日本官方对华宣传战》，《江海学刊》2016 年第 4 期。

⑮ 戴海斌：《近卫笃麿与 19、20 世纪之交的中日关系》，《学术月刊》2016 年第 9 期。

⑯ 张永攀：《乾隆末至光绪初藏哲边界相关问题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 年第 3 期。

上海租界各方在处理会审公廨权限之争过程中的态度及背后的考量①；江天岳考察了中外不同视角下对法国舰队司令卜罗德战死后各方的反应，揭示了法国与清政府在“华洋会剿”中的微妙关系②；郭丽娜探讨了广州湾在法属印度支那联邦中处于“边缘化”地位的原因，认为这首先服务于法国的均势战略，其次则服务于法属印度支那联邦的灰色财税需求。③

法制与法律实践 在清代法制史方面，有四篇关于律例的研究颇有见地。陈重方纠正成说，考证了《大清律例》纂修与颁行的确切时间和情形；陈煜探讨了《大清律例》与各部院则例的衔接问题，认为这种衔接在清代前中期促进了法律体系内部的统一；李明考察了作为清代立法机构的律例馆，对其设立及职能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考辨；沈欣关注了乾隆初年内务府建立律例官学，以教习内府旗人子弟学习律例的情况。④ 此外，胡祥雨探讨了清代法律的常规化面相，认为旗人换刑特权并非满汉不平等的政局，而是清廷废除满洲刑罚体制以适应汉人法律的产物，且这种特权也在法律演变过程中不断遭到削弱。⑤ 包斯勤等指出，清代蒙古律中存留养亲制度的形成，反映了蒙古律与内地法律制度逐渐趋近的变化趋势，也体现了作为特别法的蒙古律与国家基本法典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⑥ 李欣荣分析了 1907 年的修律权之争，认为其后确立的立法新制直接影响了清季最后数年的法制建设。⑦

关于清代法律的社会实践，石怡等人通过剖析清代江苏沙田讼争案件，认为该地与珠江三角洲情形呈现的传统国家“无为”景象不同，反映了清朝国家对沙田民事法秩序的积极构建。⑧ 张万军通过对蒙汉杂居地区萨拉齐厅通判刑事司法管辖权的探讨，认为其中体现了清政府因地制宜的刑事司法政策，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⑨ 李明和汪锋华都探究了清代命案中的一个痼疾即顶凶现象，也都认为这是清代司法运行中的制度性失误所致。⑩ 林展等人利用清代刑科题本中的债务命案，考察了以命案结束的借贷交易在契约订立和执行方面的特征，发现这些交易中的模糊性是引发命案的重要诱因。⑪ 此外，郑小悠探讨了清代刑部官员的法律知识和水平问题，认为大多数官员都是在进入刑部后的实践中学习法律知识，刑部亦成为法律知识传播的大本营。⑫

边政与边疆社会 在边政问题上，成果较多的区域是蒙古和新疆。关于蒙古地区，乌云毕力格根据对满文题本的解读，展现了康熙初年清廷在喀尔喀人中设立一个扎萨克旗的具体过程。⑬ 哈斯巴根利用新近发现的满文档案，厘清了蒙古镶白旗一个牛录的佐领承袭、牛录人员构成等情

---

① 侯庆斌：《上海租界会审公廨间的权限之争》，《史林》2016 年第 4 期。

② 江天岳：《“卜罗德之死”的历史省思——兼论法国与清政府在“华洋会剿”中的关系》，《清史研究》2016 年第 2 期。

③ 郭丽娜：《论广州湾在法属印度支那联邦中的“边缘化”地位》，《史林》2016 年第 1 期。

④ 陈重方：《论〈大清律例〉与各部院则例的衔接》，《法制史研究》第 29 卷（2016 年 6 月）；陈煜：《乾隆八年〈大清律例〉的颁行》，《法制史研究》第 29 卷（2016 年 6 月）；李明：《清代律例馆考述》，《清史研究》2016 年第 2 期；沈欣：《清乾隆初年律例官学小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 年第 3 期。

⑤ 胡祥雨：《清代法律的常规化：族群与等级》，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

⑥ 包斯勤等：《清朝蒙古律“存留养亲”制度形成初探》，《民族研究》2016 年第 1 期。

⑦ 李欣荣：《1907 年修律权纷争与立法新制的建立》，《社会科学研究》2016 年第 6 期。

⑧ 石怡等：《利民沙案与清代江苏沙田民事法秩序之构建》，《史学月刊》2016 年第 6 期。

⑨ 张万军：《清代萨拉齐厅通判刑事司法职能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5 期。

⑩ 李明：《为爱鬼头银，命比鸿毛轻——清代命案中的贿买顶凶》，《法制史研究》第 29 卷（2016 年 6 月）；汪锋华：《生命的畸形博弈：清代命案中的顶凶现象新考》，《安徽史学》2016 年第 5 期。

⑪ 林展等：《乾隆中期和道光中后期债务命案研究》，《清史研究》2016 年第 2 期。

⑫ 郑小悠：《清代刑部官员的法律素养》，《史林》2016 年第 3 期。

⑬ 乌云毕力格：《康熙初年清朝复归降喀尔喀人的设旗编佐》，《清史研究》2016 年第 4 期。

况。[1] 彭瑞轩等探讨了清朝在蒙古地区设置扎萨克制度的功效。[2] 齐木德道尔吉利用满蒙文资料，揭示了归化城土默特部归附清朝过程中，额尔德尼囊苏喇嘛所起到的特殊作用。[3] 乌兰巴根考察了清末库伦开设驻京文报局、改用邮局传递文报的史实，展现了新政对于边政的影响。[4] 关于新疆地区，鲁靖康等以塔尔巴哈台为例，为理解清代边疆地区厅级行政区划的演进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5] 聂红萍考察了乾隆时期在新疆管辖问题上从隶属甘肃总督到伊犁将军的探索过程，认为这反映了乾隆朝君臣对新疆认识的变化。[6] 褚红霞论述了乾隆统一天山南北后的移民实边政策及其成效。[7] 方华玲考察了新疆废员在戍管理制度的确立，以及由此对清代新疆社会历史发展所带来的影响。[8]

另有一些研究关注了其他边疆地区的边政。冯志伟等探究了清朝涉藏刑事案件的处理原则，从法律和政治层面揭示了案件处置背后的政治理念。[9] 李小雪勾勒了奉天地区旗民二重管理体制的形成过程。[10] 张荣等确认，清朝对卡外界内哈萨克“封官授爵”，的确是后者实际成为清朝属民的一个重要依据。[11] 武沐等阐明了希布察克部布鲁特在乾嘉年间的特殊地位及其在清朝治理回疆过程中所扮演的典型角色。[12] 此外，柳岳武剖析了清代藩属体系形成及解体过程，澄清了藩部与属国两个体系间的本质区别。[13] 李强等详细探讨了清朝与坎巨提宗藩关系中几个重要问题及其意义。[14]

边疆经济是边疆社会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刘壮壮等探讨了清朝统一新疆后商人农业经营的迅速兴起及其作用。[15] 王启明依据新发现资料，揭示了晚清时期新疆牙行对市场交易的促进作用。[16] 丁君涛和赵超都以新疆吐鲁番地区买卖契约为基础，考察了清末民国时期当地葡萄园价格的变化，补充了对于西部土地交易的认识。[17] 张喜琴分析了清末新疆对俄贸易结构对当时产业结构的影响。[18] 柳岳武以晚清各蒙旗为中心，讨论了清廷“兴边利”政策的出台、实施及其得失。[19] 此外，赵海霞论述了清代新疆的民族迁徙情况，认为这对巩固西北边防、抵御沙俄侵略、维护祖国统一等方面有着积极贡献。[20]

---

① 哈斯巴根：《清初蒙古多罗特部的政治变迁》，《社会科学战线》2016 年第 6 期。

② 彭瑞轩等：《清代北方边疆建置研究：以蒙古地区扎萨克制度为中心》，《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4 期。

③ 齐木德道尔吉：《额尔德尼囊苏喇嘛与归化城土默特部的归附》，《民族研究》2016 年第 6 期。

④ 乌兰巴根：《清末库伦办事大臣衙门开设驻京文报局考论》，《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 年第 3 期。

⑤ 鲁靖康等：《清代边疆政区设置的变通与调适——以塔尔巴哈台为例》，《西域研究》2016 年第 3 期。

⑥ 聂红萍：《从甘肃总督到伊犁将军：乾隆朝对新疆治理的探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 年第 2 期。

⑦ 褚红霞：《乾隆时期新疆移民落籍政策探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 年第 1 期。

⑧ 方华玲：《“赏”与“罚”：论乾嘉道时期新疆废员在戍得赏衔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 年第 3 期。

⑨ 冯志伟等：《清王朝涉藏刑事案件处理问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

⑩ 李小雪：《清初奉天地区旗民二重管理体制的形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 年第 1 期。

⑪ 张荣等：《试论清朝对哈萨克的“封官授爵”》，《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 年第 2 期。

⑫ 武沐等：《论乾嘉年间希布察克部布鲁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 年第 3 期。

⑬ 柳岳武：《清代藩属体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16 年。

⑭ 李强等：《清与坎巨提宗藩关系中的几个问题》，《西域研究》2016 年第 3 期。

⑮ 刘壮壮等：《清代新疆“商营农业”探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 年第 2 期。

⑯ 王启明：《从档案看牙行与晚清新疆税收》，《历史档案》2016 年第 1 期。

⑰ 丁君涛：《清末民初吐鲁番葡萄地价的变化》，《西域研究》2016 年第 4 期。赵超：《略论清末吐鲁番地区以谷付息的土地典当》，《西域研究》2016 年第 4 期。

⑱ 张喜琴：《清末新疆对俄国出口结构和新疆地区农业结构的关系》，《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3 期。

⑲ 柳岳武：《晚清“兴边利”研究：以各蒙旗为中心的视角》，《社会科学》2016 年第 3 期。

⑳ 赵海霞：《论清代新疆民族迁徙及其对民族关系的影响》，《西域研究》2016 年第 1 期。

二、经济史研究

在经济史研究整体不振的背景下，2016 年清代经济史研究成果不仅维持了较为可观的数量，具有较高水平的成果亦复不少。尤其是在赋税、市场和贸易等一些传统重大论题上，不乏亮点出现。当然，总体来看，现下的清代经济史研究仍然处在基础性积累阶段，未能对经济史研究既有范式进行深度反思和推进，形成更具突破意义的研究态势还有待时日。

财政体制与政策　这方面以赋役问题最受关注。盛承以黄陂县为例，探讨州县层级上王府庄田与更名田的实践过程及其引起的赋税演变，有助于深化对明清赋役制度史研究路径的认识。①陈雪探讨了以往研究较为薄弱的清初战时财政问题，指出当时陕西的田赋征收受战事影响，大都改折征本，以应对军队对本色粮米的需求。② 黄忠鑫基于碑刻资料，指出清中叶广东的“折甲分催”是对图甲体制的一次地方性赋役改革。③ 范金民考察了乾隆初年对江苏积欠钱粮的清查，指出这有助于全面认识清廷与地方税粮博弈史的基本面貌。④ 舒满君等人以歙县为例，分析了太平天国战后田赋征收机制中的抵征办法及其在乡村实践中的适应和变化。⑤ 李光伟考察了光宣年间为革除赋税征缴积弊而推行的征信册制度，认为这种信息公开制度虽以失败告终，但其原理却是治理官吏财政违纪的必由路径。⑥ 此外，周健分析了雍正时期尹继善在江苏推行漕务改革的情况，认为其精神与“耗羡归公”相似，也在雍乾之际取得了较好效果。⑦ 黄凯凯梳理了四川省的盐课归丁制度，认为这是一项田赋附加税，也是传统政府赋税征收方式的重要转变。⑧ 张坤考察了道光年间的行商制度危机，认为此次危机促使外商集体开始施压改革行商制度，清廷由此进行了较大范围的调整。⑨ 周育民审视了从康熙年间的江海关到上海开埠后设立江海新关的过程，认为上海外籍税务司的建立并非制度演变的一个重大标志。⑩

财政管理和运行，也是成果较多的论题。倪玉平探讨了咸同时期财政体制的转变特征，认为清廷此时放弃了“量入为出”的理念而步入了“量出为入”的阶段，开启了由“国家财政”向“财政国家”转变的道路。⑪ 刘增合勾勒了清末新政期间实施的财政监理制度，认为基本实现了督责各省外销财政核实上报、建立近代预算制度的目标。⑫ 何平从观念史的角度分析了清前期货币结构的变化和动力以及当时人们的对策和思考，指出一国一通货性质的信用货币创造机制由于缺乏制度改进而在清代前期未能实现。⑬ 和文凯从小额货币的视角考察了乾隆时期在制钱供给方面的政策讨论与实践，认为与 18 世纪英国政府的做法相比，乾隆朝后期银钱比价的稳定是前现

---

① 盛承：《从王府庄田到更名田：明清州县赋税演变新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6 年第 3 期。
② 陈雪：《川运与汉运：顺治年间陕西的军粮筹措》，《清史研究》2016 年第 1 期。
③ 黄忠鑫：《清代广东“折甲分催”考释》，《清史研究》2016 年第 1 期。
④ 范金民：《清代乾隆初年江苏积欠钱粮清查之考察》，《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1 期。
⑤ 舒满君等：《太平天国战后歙县的田赋征收机制》，《近代史研究》2016 年第 3 期。
⑥ 李光伟：《清季赋税征信制度设计探论》，《史学月刊》2016 年第 6 期。
⑦ 周健：《尹继善的“耗漕归公”与 18 世纪江苏漕务》，《史林》2016 年第 5 期。
⑧ 黄凯凯：《清代四川专商引岸制度下的盐课归丁》，《史学月刊》2016 年第 8 期。
⑨ 张坤：《道光九年（1829）前后的行商制度危机及其调整》，《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 年第 5 期。
⑩ 周育民：《从江海关到江海新关（1685—1858）》，《清史研究》2016 年第 2 期。
⑪ 倪玉平：《从“国家财政”到“财政国家”：试论清朝咸同时期的财政转型》，《社会科学辑刊》2016 年第 6 期。
⑫ 刘增合：《纾困与破局：清末财政监理制度研究》，《历史研究》2016 年第 4 期。
⑬ 何平：《清代前期多元复合货币结构下的困惑与对策》，《清史研究》2016 年第 3 期。

代经济中政府为市场提供小额货币相对成功的一个例子。① 张世慧分析了 19 世纪前中期制定的“京城钱铺关闭例”，认为这是清政府开始通过调整律例制度，对早期全球化过程中商业秩序变动而进行的调整与应对。② 熊昌锟揭示了张之洞在晚清自铸银元活动中的作用，指出其固然在实践中有开创之功，却也对币制改革迟迟无法实现负有责任。③

产业经济的发展变化 政府驱动下的经济行为，是清代产业经济发展的重要内容。黄敬斌探讨了明清地方行政中关于商业与市场管理的内容，认为其中地方政府关于商业政策的一般理念以及官商关系的复杂性值得注意。④ 李楠考察了清代“改土归流”政策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短期与长期影响，丰富了民族国家边疆管治的历史经验和实证证据。⑤ 张继莹以乾隆初年甘肃仓储为例，分析了清代大一统政策下推行仓储建设所面临的内在困境。⑥ 在晚清时期，政府驱动经济建设更为着力。在铁路方面，朱从兵等探讨了甲午战前铁路经费的筹措状况，认为中央专项铁路经费是清政府“权自我操”的投资性支出项目，具有重要意义。⑦ 潘崇从边疆区域新政的视角，论述了锡良的东北铁路建设计划，展示了东北铁路建设面临的中外博弈与央地歧异的双重困境。⑧ 袁为鹏探讨了甲午战后清政府对军事工业区位的调整活动，剖析了影响中国近代军事工业布局的复杂因素。⑨ 郑成林等人考察了庚子事变后清政府着手统一度量衡的行动，认为这凸显了清末新政进程中传统与现代、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等多种因素的纠结与影响。⑩

在农业方面，江太新对明清农业史中几个重大理论问题，如地主制经济体制发展变化对农业经济影响、政府政策对农业发展影响、垦荒与生态、农业发展动力、对明清时期农业发展的估价和封建社会地租率等，提出了自己多年来的深入思考。⑪ 毛亦可利用各省省志数据对清前期田土统计数据进行了修正，并据此判断清前期土地总数的增长速度比前人估计得更为平稳。⑫ 史红帅考察了军田马厂地的招垦情况，指出此举与清代西安绿营军制变革、关中土地开发、渭河滩地变迁以及认垦民众生计等具有紧密关系。⑬ 李昕升等探讨了清代番薯在江西的推广成效及其原因。⑭ 王大宾通过对清代河南地区农作物构成的分析，认为以土地出产率提高为目标的技术选择是清代农业发展的重要途径。⑮

对于其他各项产业，学界在 2016 年值得称道的成果有限。王正华通过分析清初中期苏州版

---

① 和文凯：《乾隆朝铜钱管理的政策讨论及实践——兼与 18 世纪英国小额货币管理的比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 年第 3 期。

② 张世慧：《秩序变动与律例增订：19 世纪前中期的“京城钱铺关闭例”》，《史林》2016 年第 6 期。

③ 熊昌锟：《试论张之洞与晚清自铸银元》，《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1 期。

④ 黄敬斌：《清前期江南地方政府商业管理初探》，《史学月刊》2016 年第 8 期。

⑤ 李楠：《管治方式转变与经济发展：基于清代西南地区“改土归流”历史经验的考察》，《经济研究》2016 年第 7 期。

⑥ 张继莹：《积弊与时弊：乾隆初期甘肃仓储的经营（1736—1755）》，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94 期（2016 年 12 月）。

⑦ 朱从兵等：《晚清中央专项铁路经费探析》，《史学月刊》2016 年第 8 期。

⑧ 潘崇：《锡良督东时期东北铁路规划始末》，《近代史研究》2016 年第 6 期。

⑨ 袁为鹏：《甲午战后晚清军事工业布局之调整——以江南制造局迁建为例》，《历史研究》2016 年第 5 期。

⑩ 郑成林等：《清季划一度量衡的酝酿与尝试》，《学术研究》2016 年第 5 期。

⑪ 江太新：《对明清农业发展史研究中几个理论问题的思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 年第 5 期。

⑫ 毛亦可：《清代前期的屯田数额与田土总数统计》，《清史研究》2016 年第 1 期。

⑬ 史红帅：《清代西安绿营马厂地招垦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 年第 4 期。

⑭ 李昕升等：《清代番薯在江西的引种和推广》，《中国农史》2016 年第 2 期。

⑮ 王大宾：《人地关系与作物组合——清代河南地区农作物构成》，《中国农史》2016 年第 2 期。

画产业的行销与消费，为研究前近代中下层文化商品提供了新的分析角度与方法。① 邱仲麟通过分析兰花在清代的两波商业化高潮，揭示了清代文化市场中的炒作行为。② 夏巨富考察了晚清时期香港航运业的发展，认为这是近代交通发展史中现代与传统之间博弈的一个缩影。③ 张忠民从现代企业理论的视角出发，概括了大生纱厂的早期企业制度特征。④ 罗婧以《上海年鉴》为中心，分析了开埠初期上海洋行的租地情况以及经营种类。⑤

市场、交易与产权　这方面是经济史研究历来的重点，2016 年的成果大致可分为南方和北方两大区域加以论述。南方主要以江南地区为中心，杨虎认为在明清时期海内外市场对江南丝织品需求的刺激下，加快了江南蚕桑生产的商品化过程。⑥ 吴涛等人考察了康熙时期江南的棉布交易机制，认为其中国家色彩进一步淡化、市场更加自由。⑦ 赵伟洪考察了乾隆时期江西省米谷市场的整合，并从商路角度概括了区域整合市场的特点。⑧ 谢小芹探讨了清代贵州清水江流域木材交易高涨的原因，认为区域性木材市场网络的形成、地方族群的另类生计模式是重要因素。⑨ 牟振宇依据上海道契资料，对 19 世纪四五十年代上海英租界的土地交易及土地价格进行了系统梳理与分析，并探讨了其驱动机制。⑩

北方地区主要以华北为中心。赵世瑜等人揭示了明末清初东江史事背后的海上走私贸易问题，使一个传统的政治事件具有了全球贸易史的意义。⑪ 许檀系统梳理了冀鲁豫三省的商业城镇结构，指出这些商业城镇的崛起反映了发展中的市场体系对原有行政体系的突破。⑫ 邱仲麟考察了清代北京用煤的行销体系，以期理解矿业、商业与民生问题之间的关联性。⑬ 张萍认为，清前期在官方贸易主导之下，西北地区逐渐形成统一的市场体系，而经济一体性又促成了地区行政体系的整合。⑭ 王昉等人探讨了晚清时期营口地区的货币体系“过炉银”，认为这一机制反映了当时货币市场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点。⑮ 燕红忠等人利用早期的日本调查资料，认为晚清时期的营口贸易机制反映了以华商为主导的贸易经济对东北地区开发和经济发展的推动。⑯ 穆崟臣探讨了清代山东小麦价格波动状况，认为当时山东省内各府州的麦价变动虽然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但尚不存在统一的全省米粮市场。⑰

关于产权问题，值得关注的成果主要有：周琳通过对清代巴县行帮公产纠纷案例的考察，提出

---

① 王正华：《清代初中期作为产业的苏州版画及其商业面向》，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92 卷（2016 年 6 月）。

② 邱仲麟：《兰痴、兰花会与兰花贼：清代江浙的兰蕙鉴赏及其多元发展》，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 87 本第 1 分（2016 年 3 月）。

③ 夏巨富：《浅析晚清香港轮船航运业肇兴缘由》，《历史档案》2016 年第 2 期。

④ 张忠民：《晚清大生纱厂的早期企业制度特征》，《清史研究》2016 年第 3 期。

⑤ 罗婧：《开埠初期的上海租地及洋行》，《史林》2016 年第 3 期。

⑥ 杨虎：《明清江南蚕桑生产及其行销路径与社会效应分析》，《中国农史》2016 年第 2 期。

⑦ 吴涛等：《明末清初江南的棉布交易机制与银钱使用：以松江府为中心》，《学术研究》2016 年第 5 期。

⑧ 赵伟洪：《乾隆时期江西省米谷流通与市场整合》，《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6 年第 4 期。

⑨ 谢小芹：《清代清水江流域木材交易繁盛的原因分析》，《中国农史》2016 年第 4 期。

⑩ 牟振宇：《上海开埠早期英租界土地交易、地价分布及其驱动力分析（1844—1853）》，《社会科学》2016 年第 5 期；《小刀会起义对上海英租界土地交易的影响（1854—1859）》，《史林》2016 年第 3 期。

⑪ 赵世瑜等：《重观东江：明清易代时期的北方军人与海上贸易》，《中国史研究》2016 年第 3 期。

⑫ 许檀：《明清时期华北的商业城镇与市场层级》，《中国社会科学》2016 年第 11 期。

⑬ 邱仲麟：《清代北京用煤及其运销体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94 期（2016 年 12 月）。

⑭ 张萍：《官方贸易主导下清代西北地区市场体系的形成》，《清史研究》2016 年第 4 期。

⑮ 王昉等：《晚清区域货币市场发展研究——以营口“过炉银”为中心》，《历史研究》2016 年第 3 期。

⑯ 燕红忠等：《晚清营口贸易的商业机能与市场网络》，《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 年第 4 期。

⑰ 穆崟臣：《清代山东麦价地域特征分析》，《社会科学战线》2016 年第 11 期。

了“官府掌控下的‘理性市场’”的分析框架①；龙登高等人通过比较宋代与清代典田的性质与权益，指出典权不是一种所有权交易，而清代典田租佃关系的发达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典权是使用权的交易。② 黄志繁等人以婺源县神会资产的运作为例，认为清代至民国乡村土地的“零碎化”、土地表述的“租税化”和地权运作“精细化”过程的背后，反映了中国乡村产权观念的重大变化。③

中外贸易与经济交流　张海英考察了明清时期中国与朝鲜半岛的各种民间贸易活动，认为这些贸易在东亚国际贸易中具有重要影响。④ 张晓东探讨了明清时期上海港在丝路贸易被殖民贸易取代的历史进程中，上海地区的贸易历史传统优势仍被西方人所注意。⑤ 章忠民等人认为，明清海洋经略方式是导致海上丝绸之路衰落、海权渐失的内在因素。⑥ 金峰考察了清代构建与朝贡贸易体制相适应的口岸体系，认为这一体系能够满足传统外贸发展的需要。⑦ 王睿考证了美国商船“大土耳其”号于乾隆末年抵达广州贸易的情况，深化了对早期中美经贸关系的认识。⑧ 游博清通过分析 18、19 世纪之交英国东印度公司贸易利润的分配情况，认为该公司已无法有效处理 19 世纪新的社会变迁和海外贸易局势。⑨ 方前移以晚清芜湖海关外国鸦片进口情况为例，指出鸦片问题在近代中国始终有着国际因素的影响和考量，是半殖民地经济的缩影。⑩ 刘礼堂等人和陶德臣分别探讨了晚清时期中国茶业在国际贸易中的衰落和危机。⑪ 王天根考察了庚子政潮对中外开平矿权纠纷的影响。⑫ 赵欣揭示了日俄战争后英、美两国对中国东北的经济渗透情况。⑬

三、社会史研究

近年来的社会史研究已经转入了内涵式发展阶段，虽然关于社会史的理论含义仍无共识，但在具体实践上，关注下层社会结构及其演变、日常社会生活等内容，业已成为社会史学者的通行做法。2016 年的清代社会史研究，也是以这种认识加以归类的。总体看来，与政治史、经济史等门类相比，社会史研究中的高质量成果相较于总体数量的比例仍然较低。而在问题意识的提炼与突破方面，还有更长的道路要走。

宗教与信仰　基督教在中国向来是社会史研究中的重点领域之一。果美侠揭示了康熙、乾隆年间欧洲天主教会选派西洋画家入华的策略性。⑭ 钟鸣旦重审了 17 世纪至 18 世纪初关于中国礼仪之争的文献，认为 18 世纪中国信徒通过参与礼仪之争，获得了一个属于更广泛群体的跨国界

---

① 周琳：《产何以存？清代巴县档案中的行帮公产纠纷》，《文史哲》2016 年第 6 期。

② 龙登高等：《典田的性质与权益——基于清代与宋代的比较研究》，《历史研究》2016 年第 5 期。

③ 黄志繁等：《清至民国婺源县“神会”资产的运作：简论近代乡村地权的“精细化”》，《清史研究》2016 年第 3 期。

④ 张海英：《14—18 世纪中朝民间贸易与商人》，《社会科学》2016 年第 3 期。

⑤ 张晓东：《明清时期的上海地区与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活动》，《史林》2016 年第 2 期。

⑥ 章忠民等：《明清海上丝绸之路经略与海权渐失》，《社会科学》2016 年第 1 期。

⑦ 金峰：《鸦片战争前清代外贸口岸体系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 年第 1 期。

⑧ 王睿：《美国“大土耳其”号来华贸易考辨》，《清史研究》2016 年第 1 期。

⑨ 游博清：《中国贸易与利润分配：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商馆职员的薪资与福利（1786—1834）》，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92 卷（2016 年 6 月）。

⑩ 方前移：《口岸市场上中外鸦片的竞争与替代（1877—1912）》，《安徽史学》2016 年第 3 期。

⑪ 刘礼堂等：《信息不对称与近代华茶国际贸易的衰落》，《历史研究》2016 年第 1 期；陶德臣：《晚清时期外国人对近代中国茶业危机的认知》，《中国农史》2016 年第 4 期。

⑫ 王天根：《庚子政潮及对中外开平矿权纠葛的影响》，《史学月刊》2016 年第 11 期。

⑬ 赵欣：《日俄战争后英美两国对中国东北的经济渗透》，《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 年第 1 期。

⑭ 果美侠：《论 17—18 世纪天主教会对清宫西洋画家的选派》，《故宫博物院院刊》2016 年第 3 期。

的意识。[1] 吕颖以教会通信为依据，探讨了 18 世纪末耶稣会被取缔后北京法国传教团所面临的困境。[2] 李中勇探讨了道光后期法国三次向琉球派遣传教士，并由此引发中法交涉的情形。[3] 陈海容等根据内地会出版物，勘正了晚清时期内地会在徽州传教情况的记载。[4] 陶飞亚等从国家治理角度审视了晚清政府与基督教关系的演变，认为庚子之后官教双方合作治理寻求共识，才初步纾解了基督教问题的困局。[5] 董丛林探讨了天津教案后总理衙门筹议《传教章程八条》的情况，认为这标志着清朝开始运筹善后性防范的措施。[6] 郭秀文分析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独创的宗教传播策略。[7] 庄宏忠探讨了 19 世纪蒙古和满洲天主教事务深受国际环境影响的状况。[8] 欧阳哲生钩沉了反映 1860 年以前俄罗斯传教团在北京活动情况的稀见文献。[9] 肖清和等和季芳桐都以云南地区回教人士的著述为中心，考察了晚清时期伊斯兰教与基督教对话和交流的状况。[10]

中国本土宗教与信仰，是另一个备受关注的主题。裴艾琳探讨了明清两代江南地区地方宗教蓬勃发展的原因，认为这是一种来自基层社会的自我选择性和自主性的凸显。[11] 李恭忠从民间文化的语境重新审视了天地会的起源传说，认为其中的抗争逻辑体现了对于皇权的想象性竞逐，天地会在日常社会生活层面则沦为一种内外有别的集团暴力。[12] 郑莉依据东南亚地区华人碑铭资料，考察了海外华人早期庙宇网络的创建过程。[13] 曹新宇以黄天道民间文书和田野调查为基础，从地方视角出发，力图突破传统宗教史、社会史与制度史的藩篱，更为精细地呈现出白莲教的思想和信仰状况。[14] 张小军从“文化资本”视角出发，探讨了元代以降漕运贸易中天后信仰及其民教伦理的作用。[15] 张景平等考察了明清以来河西走廊龙王庙信仰的发展演变。[16] 李恭忠对所谓“洪门民族主义”论说进行了审视，认为这主要是清末激进知识人和革命派出于排满这一目标进行发掘和重新解释的结果。[17]

宗族与地方社会 人类学视角下的宗族研究更关注文化建构，历史学本位的宗族研究明显更倾向于对历史活动的挖掘。徽州地区以其丰富资料，历来是宗族研究的富矿。冯尔康勾勒了徽州名族的社区建设活动及其积极作用。[18] 郑小春探讨了乾隆朝谱禁政策对徽州民间修谱活动产生的

---

① 钟鸣旦：《礼仪之争中的中国声音》，《复旦学报》2016 年第 1 期。
② 吕颖：《从传教士的来往书信看耶稣会被取缔后的北京法国传教团》，《清史研究》2016 年第 2 期。
③ 李中勇：《1844—1848 年中法关于在琉球的法国传教士之交涉考》，《历史档案》2016 年第 2 期。
④ 陈海容等：《中华内地会与徽州的渊源》，《安徽史学》2016 年第 4 期。
⑤ 陶飞亚等：《晚清国家基督教治理中的官教关系》，《中国社会科学》2016 年第 3 期。
⑥ 董丛林：《天津教案后〈传教章程八条〉的筹议与夭折》，《社会科学辑刊》2016 年第 5 期。
⑦ 郭秀文：《〈东西洋考每月统计传〉的宗教传播策略》，《学术研究》2016 年第 8 期。
⑧ 庄宏忠：《19 世纪天主教蒙古传教区东部界线争端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 年第 2 期。
⑨ 欧阳哲生：《俄国东正教传教团的管理、资产及其北京文献》，《华中师范大学学报》2016 年第 3 期。
⑩ 肖清和等：《中国回耶对话的典范》，《史林》2016 年第 1 期；季芳桐：《清末中国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对话研究》，《云南社会科学》2016 年第 2 期。
⑪ 裴艾琳：《神意与民意：明清江南地方宗教中裹挟的社会意识与民众选择》，《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4 期。
⑫ 李恭忠：《蒙冤叙事与下层抗争：天地会起源传说新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 年第 5 期。
⑬ 郑莉：《明清时期海外移民的庙宇网络》，《学术月刊》2016 年第 1 期。
⑭ 曹新宇：《祖师的族谱——明清白莲教社会历史调查之一》，博扬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6 年。
⑮ 张小军：《天后北传与漕运贸易：一个文化资本的视角》，《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 年第 4 期。
⑯ 张景平等：《从龙王庙到水管所——明清以来河西走廊灌溉活动中的国家与信仰》，《近代史研究》2016 年第 3 期。
⑰ 李恭忠：《辛亥前后的“洪门民族主义”论说》，《近代史研究》2016 年第 6 期。
⑱ 冯尔康：《明清徽州名族对社区的建设及其积极作用》，《安徽史学》2016 年第 4 期。

影响，认为对提高谱牒的质量具有一定的作用。[①] 王浩根据徽州文书史料的特点，以祁门黄氏为中心，探讨了村落区域范围内的社群生活。[②] 胡中生考察了清代徽州地区女性葬礼，认为礼法不断被突破而向俗尚靠拢，体现出了鲜明的地方特色。[③]

关于其他地区的宗族状况，王菲菲以《诗山凤坡梁氏宗谱》为例，认为其背后体现了在明清时期闽南乡族自治化趋势下，国家政权存在的重要意义。[④] 钱杭考察了明清以来山西省沁县族谱的特点，认为这既与移民宗族在沁县的发展阶段有关，又反映了族人以整合兄弟关系来增强宗族内向性和凝聚力的要求，是“亲亲”传统的延续。[⑤] 张仁善讨论了清代宗族的纠纷化解功能，认为这分担了国家的司法压力，降低了民众的司法成本，节约了国家司法资源。[⑥] 王跃生结合清代法律与宗族规例，探讨了不同形式的制度对立嗣过继的规定和相互影响。[⑦] 郑榕通过考察清初“复界”后福建沿海的主客之争，分析了地方宗族如何运用文化资源建构祖先历史的策略。[⑧] 董建辉等分析了清代台湾埔里盆地的族群变动，指出人口迁移和土地资源竞争是影响这一时期族群关系的主要力量。[⑨]

在地方社会秩序问题上，以水利为中心的成果较为丰富。王虹揭示了明清以来天门县的水利困境以及地方水利秩序的特征。[⑩] 周亚考察了明清以降晋南龙祠地区水权的演变状况。[⑪] 张朝阳探讨了清代江南官河、官湖纠纷背后的“公众”维权性质。[⑫] 陈瑶以湘江为例，考察了清前期河道社会管理制度演变的原因与过程。[⑬] 王日根等从社会史和制度史的角度，对明清江河湖海水域中官、民与盗之间的博弈关系进行了系统考察。[⑭]

官府与民间的关系，是考察地方社会秩序的另一重要主题。白亚仁重新考述了清初庄氏史案的始末，展现了湖州地方社会风气以及该案为江南士人留下的记忆创伤。[⑮] 严宏认为清代基层行政造成国家对乡村资源的过度汲取，最终导致国家对乡村社会控制的削弱。[⑯] 刘熠勾勒了清末四川基层书院改设学堂的历程，从侧面揭示了清末俗与制、上与下、新与旧之间关系的变化。[⑰] 梁仁志探讨了清代民间公项经费的存典生息，认为这为构建公益经费保障体系奠定了基础。[⑱] 赵思渊以戊戌后的常熟地区为例，探讨了地方政治的发展，以及清赋、新学与士绅身份意识转变之间的复杂关系。[⑲]

---

① 郑小春：《清乾隆朝谱禁与徽州宗谱之重修实践》，《史学月刊》2016 年第 7 期。
② 王浩：《19 世纪前期徽州宗族的日常生活》，《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2 期。
③ 胡中生：《礼法与俗尚：清代徽州女性葬礼再探》，《安徽史学》2016 年第 4 期。
④ 王菲菲：《试论族谱粉饰现象背后的宗族建构与策略选择》，《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6 年第 4 期。
⑤ 钱杭：《沁县族谱中的“门”与“门”型系谱：兼论中国宗族世系学的两种实践类型》，《历史研究》2016 年第 6 期。
⑥ 张仁善：《论清代宗族的纠纷化解功能》，《法制史研究》第 29 卷（2016 年 6 月）。
⑦ 王跃生：《清代的立嗣过继制度考察》，《清史研究》2016 年第 2 期。
⑧ 郑榕：《谁之庙宇 祠堂何在——清初复界后漳泉沿海的主客之争》，《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6 年第 4 期。
⑨ 董建辉等：《移民、土地与清代埔里盆地的族群关系》，《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6 年第 3 期。
⑩ 王虹：《明清时期天门县的水利困境与地方水利秩序》，《江汉论坛》2016 年第 4 期。
⑪ 周亚：《明清以来晋南龙祠泉域的水权变革》，《史学月刊》2016 年第 9 期。
⑫ 张朝阳：《公众权益与 17—18 世纪江南官河、官湖纠纷》，《中国农史》2016 年第 3 期。
⑬ 陈瑶：《明清湘江河道社会管理制度及其演变》，《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 年第 1 期。
⑭ 王日根等：《明清河海盗的生成及其治理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 年。
⑮ 白亚仁：《江南一劫：清人笔下的庄氏史案》，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 年。
⑯ 严宏：《基层行政、资源汲取与分利秩序——对萧公权语境中十九世纪国家与乡村的分析》，《中国农史》2016 年第 3 期。
⑰ 刘熠：《官府与民间的离合：清末四川基层书院改办学堂的历程》，《学术月刊》2016 年第 8 期。
⑱ 梁仁志：《商业与公益之间：清代民间公项经费存典生息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6 年第 2 期。
⑲ 赵思渊：《士气之藩篱：清末常熟清赋中的士绅身份意识转变》，《历史研究》2016 年第 6 期。

另有一些研究则探讨了关于地方社会的生活空间、情境等问题。王卫平勾勒了明末清代江南地区善堂善会一脉贯通的传统。① 冯贤亮以葬亲社为例，探讨了明清以来浙西乡村施善活动的特点。② 其另一篇文章则透过松江董氏家族日常生活场域，展现了清初地方社会的具体情态。③ 常建华依据嘉庆朝刑科题本提供的信息，揭示了清中叶山西的日常生活状况。④ 李细珠利用《管庭芬日记》，呈现了鸦片战争前后传统乡村士绅的生活世界。⑤

医疗与性别　医疗社会史是近十年来兴起的热点领域之一。吴玉娴探讨了 19 世纪以来澳门华人中普通民众与精英对于西医的不同心态。⑥ 齐君梳理了任职于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赵元益译介西医书籍的努力与贡献。⑦ 李恒俊探讨了西医听诊器和听诊技术在晚清中国的传播和接受过程，认为其对西医在近代中国立足起了重要作用。⑧ 章原分析了《申报》上关于中西医之争的社论，认为其医学观点与洋务思想相近。⑨ 余新忠的专著从“卫生”概念的演变入手，探讨了清代与防疫和城市环境卫生相关的问题及其历史变迁脉络。⑩

在性别研究方面，2016 年值得注意的是两部专著。其一是黄克武通过分析明末以来男性的谈笑内容的时代变化，展现了男性世界中存在的各种欲望与正统秩序之间的张力。⑪ 其二则是夏晓虹根据报刊杂志资料，对晚清知识精英将“国民常识”播植于女界的实践过程进行了深入探究。⑫

四、学术与思想文化

就数量而言，2016 年清代学术与思想文化史方面的成果颇为可观，却与社会史情形相似，高质量成果所占比例亦有不小的提升空间。此外，该领域在研究主题的分布上很不均衡。大体上，以清前期为主要时段的研究更多集中于以经学为主体的传统学术上，晚清时期的研究则更注重与中西文化交流以及近代思想家群体等主题上。当然，像历史语言、大众文化等论题的成果虽然较少，但呈现出来的生机令人欣慰。

传统学术与文教　清代理学近年来得到了较多注意。姜家君通过剖析蓝鼎元将理学在实学的方向上重新定位的努力，以期展现清初理学的转向。⑬ 张天杰探讨了陆陇其在清初“由王返朱”思潮中的作用。⑭ 黄爱平聚焦于方东树晚年所著家训《大意尊闻》，展示了其恪守理学的理念。⑮ 范广欣以刘蓉为个案，讨论了晚清湖南理学家学问与经世的关系。⑯ 曾礼军考察了浙东学派从清

---

① 王卫平：《慈风善脉：明末清代江南地区的慈善传承与发展》，《苏州大学学报》2016 年第 3 期。

② 冯贤亮：《葬亲社：清代浙西乡村地方士人的施善活动与传承变化》，《浙江学刊》2016 年第 3 期。

③ 冯贤亮：《清初地方士人的生活空间与场境变换》，《学术月刊》2016 年第 5 期。

④ 常建华：《清中叶山西的日常生活》，《史学集刊》2016 年第 4 期。

⑤ 李细珠：《乡村士绅在“近代”边缘的生活世界：嘉道咸同时期管庭芬日记解读》，《社会科学研究》2016 年第 3 期。

⑥ 吴玉娴：《十九世纪澳门华人医疗研究》，《澳门理工学报》2016 年第 3 期。

⑦ 齐君：《赵元益与近代中西医学交流》，《史学月刊》，2016 年第 2 期。

⑧ 李恒俊：《听诊器与西医医疗技术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接受（1844—1910）》，《自然辩证法通讯》2016 年第 4 期。

⑨ 章原：《从〈申报〉论说文看晚清中西医之争》，《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6 年第 5 期。

⑩ 余新忠：《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 年。

⑪ 黄克武：《言不亵不笑：近代中国男性世界中的谐谑、情欲与身体》，联经出版公司，2016 年。

⑫ 夏晓虹：《晚清女子国民常识的建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

⑬ 姜家君：《蓝鼎元的实学思想与清初理学转向》，《东南学术》2016 年第 5 期。

⑭ 张天杰：《陆陇其的四书学与清初的“由王返朱”思潮》，《浙江社会科学》2016 年第 10 期。

⑮ 黄爱平：《清代理学家方东树家训及其思想探析》，《中国文化》2016 年第 2 期。

⑯ 范广欣：《刘蓉的“门户之见”与理学家的经世观念》，《学术月刊》2016 年第 8 期。

初至清末的传承和延续，认为其学术特质发生了由陆王学统转向程朱学统的转型。①

对于清代传统学术，更多学者还是着重于汉宋关系上。罗检秋对通行的汉学分派看法进行了反思，提出应从家学传衍来梳理汉学脉络。② 孙运君探讨了汉宋兼采思想学派在清中后期崛起的原因，认为这透露出清代学术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向。③ 肖永明等通过分析黄式三所著《论语后案》，展现了汉宋兼采理念在经典诠释中的具体落实。④ 黄爱平深入揭示了阮元折衷汉宋的思想倾向。⑤ 於梅舫重新梳理了清代学术史构架的形成与演变过程，认为以汉宋分立为清代学术主线的叙述模式，大多经阮元以下的学者不断叠加生成。⑥ 赵四方通过探究《九经古义》的成书过程，考寻了惠氏汉学思想的形成轨迹。⑦ 张循和苗润博对清代汉学家是否通过篡改《四书反身录》来贬损宋学的问题展开了争论。⑧ 另有两篇文章重新探讨了考据学的成因。王坚认为，以往关于清代江南考据学派成因的说法皆不确切，其首要因素乃是清代皇权制度设计以及有偏向调控塑造江南学术生态发展的一种结果。⑨ 张循提出，清代考证学兴起的线索是多元的，"文士"的词章传统就是其中的一条线索。⑩

有关文教问题，主要成果有：王小舒揭示了康熙初即墨黄氏家族因"黄培诗狱案"而导致黄氏作家文学风尚发生了变化。⑪ 姜海军认为，《四库全书》的编纂表面上彰显了乾隆时期的文治之盛，实则是朝廷为了解决朝野、南北学术思想的对立而进行的政治举措。⑫ 林存阳以乾嘉时期四大幕府为研究对象，探讨了清廷政治文化导向与学术内在发展逻辑之间的互动。⑬ 辛智慧分析了庄存与在《春秋正辞》中的大一统立场，揭示了其卫道护统的学术旨趣是对官学的响应。⑭ 孙明通过对光绪年间黄宗羲、顾炎武从祀文庙之争的考察，揭示了学术发展与士大夫地缘集团权势的微妙关联。⑮

中西文化交流 早期中学西传的历史得到了越来越细致的研究。张西平通过对来华西方教会代表人物和机构的研究，全面梳理和总结了 16 至 18 世纪儒学西传欧洲的情形。⑯ 司佳考察了雍正年间颁布的白话文《圣谕广训衍》于 19 世纪后期被译成中文—拉丁文学习文本的情况，认为这一学习路径与 18 世纪前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对中国传统经典的侧重有着策略上的区别。⑰

相对而言，西学对中国的影响更为巨大，得到的关注也更多。汤开建根据葡中第一手档案文

---

① 曾礼军：《清代浙东学派的传承衍化及其学术地位》，《浙江社会科学》2016 年第 5 期。
② 罗检秋：《试析清代汉学分派的困境》，《江海学刊》2016 年第 3 期。
③ 孙运君：《从宋汉兼采思想兴起看清代学术的现代转向》，《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5 期。
④ 肖永明等：《晚清汉宋兼采思潮中的论语诠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3 期。
⑤ 黄爱平：《论阮元折衷汉宋的兼容并包思想》，《扬州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3 期。
⑥ 於梅舫：《学海堂与汉宋学之浙粤递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 年。
⑦ 赵四方：《九经古义与惠栋汉学思想的形成》，《学术月刊》2016 年第 3 期。
⑧ 张循：《〈四库全书总目〈四书反身录〉提要〉辨证》，《清史研究》2016 年第 1 期；苗润博：《四库提要篡改〈四书反身录〉说驳议》，《清史研究》2016 年第 3 期。
⑨ 王坚：《皇权调控与士人转向：清代江南考据学派成因新论》，《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 年第 4 期。
⑩ 张循：《"词章"与考证学——追溯清代考证学来源的一条线索》，《学术月刊》2016 年第 5 期。
⑪ 王小舒：《明清之际即墨黄氏家族的政治劫难及其诗风转变》，《文史哲》2016 年第 3 期。
⑫ 姜海军：《清中期南北学术的分立、一统与〈四库全书〉的编纂》，《史学史研究》2016 年第 2 期。
⑬ 林存阳：《乾嘉四大幕府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
⑭ 辛智慧：《试论庄存与〈春秋正辞〉与官学的关系问题》，《清史研究》2016 年第 3 期。
⑮ 孙明：《"必衷诸圣"与"各祭其师"：再论光绪十年至十二年黄宗羲、顾炎武从祀文庙之争》，《史林》2016 年第 2 期。
⑯ 张西平：《儒学西传欧洲研究导论：16—18 世纪中学西传的轨迹与影响》，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 年。
⑰ 司佳：《晁德莅与清代〈圣谕广训〉的拉丁文译本》，《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2 期。

献，系统梳理了西洋文明于明清时期在澳门的传播。① 韩琦依据中西文献，认为康熙帝首次明确表达了“西学中源”的观念。② 另外一些研究则聚焦于翻译事业。王艳娟以日人所著《万国史记》的翻译和出版为例，探析了世界历史知识传入清末知识界的路径及其影响③；元青等揭示了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中的中国译员群体的概况④；赵少峰勾勒了清末康、梁等人开办的广智书局译介外国史书的情形。⑤

另一些研究则集中于西学的传播后果。陈晓华通过对乾隆年间四库馆臣的西学观及其思想来源的考察，展示了清中期中西文化的互动轨迹。⑥ 周伟驰根据洪秀全对《圣经》的解读，认为其“天国”观念具有英美千禧年主义的传统。⑦ 姚达兑勾勒了甲午战后李提摩太翻译《大同学》来回应《天演论》的情形。⑧ 黄兴涛等挖掘了现代统计知识和观念的传播与清末中国新史学之间的关系。⑨ 朱文哲探讨了清末民初以西方文化和西方历史为底色的“纪年”变革与历史时间重构的关系。⑩

思想家群体 2016 年得到关注较多的思想家是严复和梁启超。

张春林根据《政治讲义》文本的分析，透视了严复的国家思想。刘婉明通过考察严复对“官品”的翻译，认为严复借用斯宾塞理论完成了对传统国家身体隐喻的改造。刘增光从严复的宗教观入手，揭示了儒家在其思想中的位置。景天魁等通过梳理严复的天演理论体系，重新发掘了严氏对现代性的解读。成庆根据对严复历史意识的再考察，认为晚清维新派与革命派虽然撷取了社会进化的观念，却背离了严复以西方现代文明作为参照标准的进化目标。⑪

茅海建对梁启超戊戌时期的重要作品《变法通议》的写作、发表状况进行了细致考察，对如何使用这份资料提出了警醒。赖骏楠考察了清末新政时期梁启超关于“人民程度”的观念，认为其政治思想已基本实现了能与传统问题意识兼容的现代性精神的转换。韩钊认为梁启超清末对“民气”赋予的新思想内涵，为民族民主运动提供了精神支撑。杨玉圣以梁启超为中心，检讨了晚清中国政论界的美国观。焦宝关注了梁启超利用自己主持的报刊来促进晚清诗词演进的状况。⑫

---

① 汤开建：《天朝异化之角：16—19 世纪西洋文明在澳门》，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 年。

② 韩琦：《康熙帝之治术与“西学中源”说新论》，《自然科学史研究》2016 年第 1 期。

③ 王艳娟：《〈万国史记〉在清末中国的传播和影响》，《清史研究》2016 年第 3 期。

④ 元青等：《过渡时代的译才：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中国译员群体探析》，《安徽史学》2016 年第 2 期。

⑤ 赵少峰：《略论广智书局的日本史书译介活动》，《史学史研究》2016 年第 3 期。

⑥ 陈晓华：《四库馆臣的西学观及其理路》，《哲学研究》2016 年第 5 期。

⑦ 周伟驰：《洪秀全对太平天国革命的圣经解读》，《学术月刊》2016 年第 3 期。

⑧ 姚达兑：《斯宾塞福音：李提摩太译〈大同学〉及其对梁启超的影响》，《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6 期。

⑨ 黄兴涛等：《现代统计知识和观念的传入与清末新史学》，《史学史研究》2016 年第 3 期。

⑩ 朱文哲：《清末民初的纪年变革与历史时间的重构》，《史学理论研究》2016 年第 4 期。

⑪ 张春林：《严复的国家思想解析》，《兰州学刊》2016 年第 1 期。刘婉明：《从“官品”的翻译看严复对中国传统“国家身体”形象的改造》，《学术月刊》2016 年第 5 期。刘增光：《真宗教、孔教与国性：严复宗教视域中的儒家》，《哲学动态》2016 年第 4 期。景天魁等：《天演：论严复对现代性的解读》，《福建论坛》2016 年第 5 期。成庆：《晚清的“进化”魔咒：严复历史意识的再考察》，《学术月刊》2016 年第 10 期。

⑫ 茅海建：《梁启超〈变法通议〉进呈本阅读报告》，《近代史研究》2016 年第 6 期；《梁启超〈变法通议〉的写作计划、发表与集结》，《南国学术》2016 年第 2 期。赖骏楠：《晚清时期梁启超宪法思想中的“人民程度”问题》，《清史研究》2016 年第 1 期。韩钊：《清末时期梁启超“民气”论研究》，《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1 期。杨玉圣：《晚清中国政论界的美国观再检讨：以梁启超之美国宪法与政制观为中心》，《文史哲》2016 年第 2 期。焦宝：《梁启超的思想变动与晚清报刊诗词演进》，《浙江社会科学》2016 年第 11 期。

科举、教育与大众文化　关于科举问题，王立新利用档案考订了咸同年间文闱停科的情况；李林探讨了清代武科乡试的概况；王学深考察了清代生员罢考事件，认为其背后是18、19世纪中央对地方控制力的强弱变化而发生的转变；关晓红论述了清代朝考选官制度，认为光宣之际的优、拔贡朝考成为科举善后的重要内容。①

在教育方面，陈明华以温州为例，揭示了晚清时期以宾兴款为代表的教育公产，成为下层士绅处理地方事务可资调度的资源；孟义昭考察了雍正元年创建的钟山书院的规制及其成效；孔祥吉利用日本文部省档案等资料，考述了天津大学前身北洋大学堂的创成；周棉等勾勒了清末留学欧美运动的概况；徐志民剖析了清末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政策的两面性及其后果。②

关于大众文化研究，秦宗财揭示了明清时期徽州与江南刻书业的联动所引发的文化互动过程；翁筱曼考察了晚清岭南学术思潮中传承地域文化的自觉性；蒋建国论述了晚清时期阅报组织对促进社会启蒙和传播报刊文化的作用；瞿骏审视了清末上海对江浙地方读书人的文化辐射作用，认为这深刻改变了地方权势结构变迁的走向；黄爱华探讨了20世纪初以《申报》等传媒对新剧消费市场的引领和文化价值导向作用。③

历史语言与文字　李文益通过对“哈哈珠子”一词的考释，指出满文翻译中存在的模糊性影响了学人对史料的理解。④ 马子木利用满、蒙、汉文史料，考察清代唐古忒学的设立始末与制度化历程。⑤ 周润年等探讨了清代藏语言文字随着时代变迁而发生的发展变化及其特点。⑥ 黑龙勾勒了满蒙文合璧文书的形成流程，并指出满文文书对解读蒙古文文书具有有益参考。⑦ 赵永明指出，明清时期徽州土地契约文书的许多词汇，都是反映当地社会状况的特色词语。⑧ 段怀清从概念史出发，清理了晚清以来语境中的“文学”这一词语的生成发展史。⑨ 曹雯揭示了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政府对于汉字改良问题上的谨慎态度。⑩

五、环境与地理景观

随着人与自然、环境与社会的互动视角日益为史学界所接受和熟悉，史学领域新一轮分化组

---

① 王立新：《咸同年间文闱停科问题考订》，《近代史研究》2016年第5期。李林：《清代武科乡试中额及武举人群体结构试探》，《史林》2016年第6期。王学深：《“凌辱斯文”与清代生员群体的反抗——以罢考为中心》，《清史研究》2016年第1期。关晓红：《清代朝考之创制与终结》，《学术研究》2016年第11期。

② 陈明华：《清中后期宾兴款的设置与下层士绅权力的扩张》，《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孟义昭：《清代钟山书院的各项制度及其运作》，《历史档案》2016年第1期。孔祥吉：《甲午战争后的民族危机与北洋大学的创成》，《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周棉等：《清末留学欧美运动析论》，《历史档案》2016年第1期。徐志民：《日本政府的清末留日学生政策》，《史林》2016年第5期。

③ 秦宗财：《明清徽州与江南刻书的文化互动》，《历史档案》2016年第4期。翁筱曼：《晚清岭南文化传承的自觉与乡土认知的新变》，《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蒋建国：《晚清阅报组织与公共读报活动的发展》，《社会科学战线》2016年第2期。瞿骏：《小城镇里的“大都市”：清末上海对江浙读书人的文化辐射》，《社会科学研究》2016年第5期。黄爱华：《20世纪初期报刊传媒与新剧的传播》，《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

④ 李文益：《清代“哈哈珠子”考释》，《清史研究》2016年第1期。

⑤ 马子木：《唐古忒学考》，《清史研究》2016年第3期。

⑥ 周润年等：《清代藏语言文字的发展及其特点》，《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

⑦ 黑龙：《清内阁满蒙文合璧文书的形成流程、书写格式及语文特征》，《民族研究》2016年第4期。

⑧ 赵永明：《徽州土地契约文书词汇的特点及价值》，《中国农史》2016年第1期。

⑨ 段怀清：《Literature 在晚清中国的“旅行”、“落户”与“入籍”》，《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⑩ 曹雯：《19世纪80年代文字改良舆论下明治政府对于汉字汉文的态度》，《清史研究》2016年第1期。

合的势头日趋明显，环境史的兴起便是一个重要标志。而传统史学研究中，环境、地理、自然等方面的因素也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就清史范围而言，目前有关环境与地理景观的研究，已经初步构成了一个板块。也只有随着这一板块的不断壮大，对于布罗代尔所说的“长时段”或“地理时间”对历史的作用与反作用，才能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自然灾害与社会　吴小伦探讨了明清时期黄河水患对黄淮平原区域经济的不利影响。① 孟祥晓考察了清代华北平原水患对村落发展及村落之间社会联系的影响。② 张力仁以清代陕西县治为例，分析了当时城市水灾发生的过程、特征与机理。③ 余林媛等对乾隆帝在灾害救济中推行“以工代赈”的思想内容及其特点进行了概括。④ 朱浒等全面揭示了嘉道时期中国生存环境全面恶化的趋势及其社会影响。⑤ 赵晓华论述了晚清灾荒中的妇女拐卖现象，以及官府为打击拐卖犯罪作出的努力。⑥ 郭俊红以晚清“丁戊奇荒”中的阳城县为例，试图展示普通灾民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的互动。⑦ 张祥稳等以光绪晚期和州水灾为例，勾勒了官府的灾荒应对机制及其成效。⑧

生态环境与社会变迁　陈喜波等探讨了京东运河水系变迁与通州城漕运码头形成之间的关系。⑨ 孙竞昊以济宁城为例，指出明清时期北方运河城市的兴起或扩张本质上是国家政策的产物。⑩ 鲍俊林考察了明清时期“海势东迁”对苏北沿海生态环境以及淮盐经济产生的深刻影响。⑪ 王大宾探讨了清代豫北水利日益恶化而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⑫ 尹玲玲等分析了夏盖湖在宋元与明清两阶段演变的特点，指出宋元时期主要出于自然因素，明清时期则出于人文因素。⑬ 陈业新揭示了明清时期芍陂水利生态恶化问题对寿州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⑭ 姜建国考述了清代金沙江上津渡的设置及其对交通的影响。⑮ 阮宝玉等揭示了明清漕运制度推行过程中所显现的区域差异性和复杂性。⑯ 王挺研究了明清民国时期关中－天水地区城市地下水资源的区域差异情形。⑰ 汤开建根据中西文献，详细考证了明清时期 13 种外来植物传入澳门的情况。⑱ 萧凌波从农业生产、经济、人口、社会动乱等方面梳理了清代气候变化的社会影响研究进展。⑲

区划与地域格局　黄忠鑫探讨了明清时期海南巡检司的空间格局变迁，认为体现出了“次县级政区”的特征。⑳ 任玉雪等以清代东北地区行政制度演变为基础，考察了盛京围场的隶属，

---

① 吴小伦：《明清时期黄河水患的时空分布及对区域经济影响》，《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3 期。

② 孟祥晓：《水患视野下清代华北平原村落的分合与内聚》，《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3 期。

③ 张力仁：《清代陕西县治城市的水灾及其发生机理》，《史学月刊》2016 年第 3 期。

④ 余林媛等：《乾隆帝以工代赈思想内容述论》，《中国农史》2016 年第 4 期。

⑤ 朱浒等：《清嘉道时期的环境恶化及其影响》，《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6 年第 5 期。

⑥ 赵晓华：《晚清灾荒中的妇女拐卖及法律惩处》，《兰州学刊》2016 年第 9 期。

⑦ 郭俊红：《身体叙事视野中的“丁戊奇荒”》，《民俗研究》2016 年第 2 期。

⑧ 张祥稳等：《晚清官方建立皖江圩区“巨患奇荒”应对机制研究》，《中国农史》2016 年第 4 期。

⑨ 陈喜波等：《明清北京通州城漕运码头与运河漕运之关系》，《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 年第 2 期。

⑩ 孙竞昊：《明清北方运河地区城市化途径与城市形态探析》，《中国史研究》2016 年第 3 期。

⑪ 鲍俊林：《试论明清苏北“海势东迁”与淮盐盛衰》，《清史研究》2016 年第 3 期。

⑫ 王大宾：《变化趋势与空间差异——清代豫北水利问题的再认识》，《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 年第 2 期。

⑬ 尹玲玲等：《明清时期夏盖湖的垦废变迁及其原因分析》，《中国农史》2016 年第 1 期。

⑭ 陈业新：《阻源与占垦：明清时期芍陂水利生态及其治理研究》，《江汉论坛》2016 年第 2 期。

⑮ 姜建国：《跨越自然的阻隔：清代金沙江中下游津渡与川滇交通》，《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 年第 4 期。

⑯ 阮宝玉等：《明清漕粮运输方式推行中的区域差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 年第 3 期。

⑰ 王挺：《明清民国时期关中－天水地区城市地下水资源的特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 年第 3 期。

⑱ 汤开建：《明清时期外来植物引入澳门考》，《中国农史》2016 年第 5 期。

⑲ 萧凌波：《清代气候变化的社会影响研究：进展与展望》，《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 年第 2 期。

⑳ 黄忠鑫：《论明清时期海南巡检司的分布格局及其意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6 年第 1 期。

并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分析了盛京、吉林将军辖区的边界走势。① 王宏斌论述了清代前期浙江划分内洋与外洋的原则，指出当时管辖海域的宽度远大于现代国际标准。② 李甜从地理、认同等层面出发，阐述了明清时期宁国府区域格局的形成以及其中的徽州因素。③ 鲁西奇从地理学的“区域”观念与方法出发，探讨了长江中游地区人地关系的认识及演变、山区经济开发与社会建构、水利社会的形成等问题。④ 徐枫考察了雍正至乾隆中期长江口沙务管理机构具备地方行政区实质的过程。⑤

地图与地理学史　哈斯巴根论述了江户时代明清地图传入日本后，对日本绘制中国东北和蒙古地区地图产生的影响。⑥ 靳煜利用满文资料梳理了乾隆年间开展三次西域测绘的过程。⑦ 王涛利用英文航海地图等珍稀资料，考察了鸦片战争前以英国为主的欧洲国家在香港水域的地图测绘活动及其影响。⑧ 王一帆等根据对同治年间江苏地形测绘活动的考察，突破了现有关于近代中国最早地形测绘时间的认识。⑨ 刘传飞勘察了新疆地区在 19 世纪后期两次舆图测绘活动，并揭示了其对新疆编纂方志的作用。⑩ 谢皆刚探讨了中国地学会在清末试图贯通中西建立中国地理学统系的努力。⑪ 何思源则剖析了清末地理教科书中塑造国家形象和国家认同的民族主义意识。⑫

总体看来，2016 年的清史研究保持着近年来平稳发展的状态，新资料不断涌现，新学人也在不断加入和成长，各种学术会议、工作坊、讲座等学术交流活动也一如既往地繁盛。不过，在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即将完工之际，“清史研究向何处去”的问题似乎还没有成为清史学界共同重视的问题。纵观 2016 年较具规模的近 40 次学术会议，很少出现极具冲击力的论题。较有新意的亮点，大概也只有 2016 年 5 月举行的“数字人文与清史研究”会议。从此次会议部分成果在 2016 年第 4 期《清史研究》上形成的专栏可以看出，资料体量和质量上具有巨大优势的清史，在应用量化历史方面无疑也应该具有显著优势。⑬ 当然，这里的意思并非是要把数字清史说成灵丹妙药，而是希望清史学界能够清醒认识到繁盛背后的隐忧，以更为开放的姿态、更加多元的视角和方法，进一步推动清史的未来发展。最后，本文对 2016 年清史成果的介绍，实属挂一漏万，对成果的评价亦属个人私见，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

① 任玉雪等：《清代盛京围场的隶属与盛京、吉林将军辖区的分界》，《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 年第 4 期。
② 王宏斌：《清代前期浙江划分内洋与外洋的准则和界限》，《社会科学辑刊》2016 年第 2 期。
③ 李甜：《明清宁国府区域格局与社会变迁》，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 年。
④ 鲁西奇：《长江中游的人地关系与地域社会》，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 年。
⑤ 徐枫：《从太通道到海门厅：雍乾时期长江口沙务管理机构的变迁》，《史林》2016 年第 1 期。
⑥ 哈斯巴根：《日本江户时代绘制中国地图里的东北和蒙古地区》，《内蒙古社会科学》2016 年第 5 期。
⑦ 靳煜：《乾隆年间三次西域测绘再分析》，《西域研究》2016 年第 1 期。
⑧ 王涛：《鸦片战争前英人在香港水域的地图测绘及影响》，《自然科学史研究》2016 年第 2 期。
⑨ 王一帆等：《同治初年江南地区地形测绘研究》，《中国科技史杂志》2016 年第 2 期。
⑩ 刘传飞：《清光绪前中期新疆普通地图的绘制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6 年第 2 期。
⑪ 谢皆刚：《中国地学会与科学地理的构建（1909—1911）》，《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 年第 4 期。
⑫ 何思源：《地理书写与国家认同：清末地理教科书中的民族主义话语》，《安徽史学》2016 年第 2 期。
⑬ 有关论述，可参见胡恒：《数据库建设与清史研究》，《清史研究》2016 年第 4 期。